

本書暗示出，歐洲的經濟優勢可能只是暫時的。中國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紀末重新奪回這種地位。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日本和韓國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為它們採取了與歐洲不同、但卻行之有效的策略去調動勞動力，融入全球市場。沒有甚麼能夠阻止中國（和印度）做同樣的事情，只要它們的政治系統決定這樣做。果真如此的話，「東亞的復興」就會如虎添翼。

在令人驚歎。本書認為，這兩個國家之所以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因為它們採取了與歐洲不同、但卻行之有效的策略去調動勞動力，讓資本具有適應性，融入全球市場。沒有甚麼能夠阻止中國（和印度）做同樣的事情，只要它們的政治系統決定這樣做。果真如此的話，「東亞的復興」就會如虎添翼，再過二三十年，人們在寫書時就會回過頭來反思今日歐洲的全球霸主地位，發現這種「暫時的高漲」不過是一個令人驚歎、但卻轉瞬即逝的現象而已。

註釋

- ①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② Patrick O'Brie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 120 (1988): 163-200.
- ③ Jack A. Goldstone,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 issue 2 (2002): 323-89.

戈德斯通 (Jack A. Goldstone)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公共政策及傑出學人教授。研究領域為比較及歷史社會學、集體行動的分析等。著有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991)，並主編 *Revolutions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991)、*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1998)、*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2003) 等。

解釋東亞的復興

● 趙永佳

《東亞的復興》是一部以其真知灼見和開闊的分析視野見稱的出色論文集。正如該書序言所述，本書有兩個分析軸心：一、根據三種不同的時段考察東亞的發展（500年、150年和50年）；二、將東亞視為一個世界區域 (world region) —— 這裏所說的世界區域是指「幾組在廣闊的領域裏明顯地相互依賴的毗鄰國家。這些領域在空間上互有差異，在時間上經歷了演化發展」（頁5）。隨後的幾篇論文生動地說明了如何透過這兩個分析視角富有成果地分析該地區的動態特徵。

本書的強項在於，它對處於近代早期的該地區的狀況進行了歷史描述。彭慕蘭的論文概括地描述了東亞的婦女勞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如同本書其他幾

個偏於歷史描述的章節一樣，這篇論文既關注歷史，又關注現代。從歷史的層面上看，作者試圖詳細說明他在其他地方就東西方的分流提出的看法（這個看法就是，近代歐洲走上了偏於資源密集和勞力節省的發展道路）的某些寓意。另一方面，本章還提供了一個歷史背景，有助於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在現代東亞，婦女勞動參與了出口產業。

韓格理和張維安的論文揭示了近代以前中國經濟的組織結構。這篇論文採納了組織研究領域裏的制度主義方法以及格列菲 (Gary Gereffi) 關於受買主驅動的全球商品鏈的思想，巧妙地將它們用於分析帝制時代晚期中國的紡織品生產和經銷。本章的歷史撰述並無新穎之處，但合在一起看，卻提供了一個認識帝制時代晚期中國經濟的獨特視角，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兩位作者還將其論點從「傳統」時期進一步推展到二戰以後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分散的家族企業網絡參與了勞動密集型消費產品的全球商品鏈，從而引發了富有活力的經濟增長。這與兩位作者在考察帝制時代晚期中國商品生產和貿易的組織結構時得出的結論十分相似。

這兩個章節，連同杉原薰撰寫的那一章，構成了阿里吉等人的論點的骨架。阿里吉等人提出了一個解釋性結論：「在十九世紀，歐洲與東亞的經濟和政治命運出現了『大分流』。但我們不能認為，造成這種分流的原因是，與東亞體系相比，歐洲體系先前就已經擁有了技術和組織上的優勢。」(頁260，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以前，歐洲和東亞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並沒有太大的差距，從商業化、農業生產率、產品的精緻程度和人均收入來看，歐洲與東亞難分伯仲。這樣就造成了幾位作者在分析過去五百年的東西關係時指出的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涉及到歐洲國家體系異乎尋常的地理擴張」；第二個難題是，「東亞地區以隸屬的方式融入以歐洲、後來又以北美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但在隨後的一百五十年間卻迸發出異乎尋常的活力」(頁259)。

簡而言之，他們對這兩個難題的回答主要偏重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在兩個世界區域內部以及在兩個世界區域之間所起的作用」，偏重於「資本主義在影響地區和全球進程方面所起的作用」(頁262)。本書的許多章節與沃勒斯坦 (Immanuel M. Wallerstein) 關於歐洲近代世界體系的分析遙相呼應，詳細闡述了如下觀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區域體系的宏觀動態發展的重要環節。歐洲國家與東亞國家的根本區別在於，「激烈的競爭使歐洲各國相互對抗，周期性地讓一個國家代替另一個國家扮演地區霸主的角色」；相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為調節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形成統一的等級秩序奠定了基礎，同時將戰爭減少到最低限度」(頁262)。杉原薰簡要地概述了這一論點的意義：「東亞地區有一個至關緊要的缺失：在那裏，不存在民族國家的強有力的『大』政府，而民族國家總要尋求領土擴張，推動大型商業和固定資本投資。由於缺乏這種進取精神，這個地區就沒有發展航海和軍事技術的機會，而在歐洲，正是航海和軍事技術為科學和工業革命做好了鋪墊。」(頁93)阿里吉等人將十六世紀鄭和率領的遠航和鄭成功家族建立的商業王國視為例外，但有例外恰好證明有公理，從一

該書幾位作者在分析過去五百年的東西關係時指出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涉及到歐洲國家體系異乎尋常的地理擴張」；第二個難題是，「東亞地區以隸屬的方式融入以歐美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但在最近五十年間卻迸發出異乎尋常的活力」。他們對這兩個難題的回答主要偏重於「資本主義在影響地區和全球進程方面所起的作用」，與沃勒斯坦關於歐洲近代世界體系的分析遙相呼應。

般情況看，該地區缺乏建立「發展型」國家和在國家贊助下從事資本主義活動的動力。就鄭和的個案而言，朝貢體系具有如此強大的邏輯，以至於軍事遠征未能產生出自持的動態機制以支撐進一步的擴張。對中華帝國來說，「擴張帶來的經濟利益遠遠不足以支撐進行歐洲式軍備競賽所需的費用」（頁283）。另一方面，鄭成功家族在台灣建立的商業王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支持抗清鬥爭。在這種情況下，鄭成功的軍事失利和清政府的重新統一台灣便有效地消滅了資本主義力量。離開了海外領土擴張和商業擴張，東亞的經濟動態便集中在國民經濟上，集中在一國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日益加深的勞動分工上。結果，不同的微觀區域內部的近距離貿易發展得很快，而不同的宏觀區域甚或不同的國民經濟體之間的遠距離貿易則發展得極其緩慢。

離開了發展型國家，不管東亞（尤其是中國）自中世紀以來擁有怎樣的社會經濟優勢，它都無法利用這些優勢最終發展出西方的那種資本主義。本書作者一方面堅持用布勞代爾的資本主義概念來解釋；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東亞未能發展成資本主義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領土擴張的衝動和國家誘導的重商主義刺激，這就使他們的觀點又帶有亞當·斯密式資本主義的痕跡。

本書針對東亞在十九世紀的暫時落後提出了一個新的、有力的論點。這一論點明確地強調國家在推動領土擴張方面所起的作用，認為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扶植了商業企業，促進了技術進步。離開了發展型國家，不管東亞（尤其是中國）自中世紀以來擁有怎樣的社會經濟優勢，它都無法利用這些優勢最終發展出西方的那種資本主義。本書作者、尤其是主編堅持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資本主義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市場經濟」與真正的「資本主義」是有區別的。在世界經濟的三層次結構中，「市場經濟」由「買賣活動的固定參與者構成，這些參與者所得的回報大致上與買賣活動的成本和風險成正比」。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處於世界經濟的頂端，它由「貿易活動的參與者構成，這些參與者有計劃、有步驟地將最大的利潤據為己有，不管他們參與的活動（金融活動、商業活動、工業活動或農業活動）具有何種特殊性質」（頁263）。在本書作者和主編看來，到了近代初期，東亞的市場經濟已經非常發達了，但卻未能發展成資本主義，主要原因在於，東亞缺乏領土擴張的衝動，也缺乏相應的由國家誘導的重商主義刺激。用他們的話來說：「激烈的政治軍事競爭從一開始就使歐洲各國處於相互對抗的關係中，成為資本主義動力（布勞代爾意義上的）之擴大再生產的一個基本要素。這種擴大再生產不斷地在歐洲區域體系內部產生出愈來愈多的剩餘資本。……資本積累和領土擴張這個自我強化的迴圈直接或間接地構成了技術革新的主要動力，正是這些技術革新最終讓歐洲體系取得了全球統治地位。」（頁265）

這一論點借鑑了關於這個题目的許多較新的歷史研究成果。不過，若要使它成為關於東亞經驗的比較成熟的重新解釋，就需要進一步研究兩個剩下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涉及到本書採納的資本主義及其動力的概念。我在閱讀了最後一篇論文後的第一反應是，它讓我想起了布倫納（Robert Brenner）對弗蘭克（André Gunder Frank）和沃勒斯坦的激進發展理論所提出的批評^①。儘管他們試圖將自己所採納的「布勞代爾式的資本主義動力」與「亞當·斯密式的市場動力」區別開來，並將前者與馬克思關於資本的一般理論等同起來，但任何人只要熟悉發生於70年代的依附理論與其馬克思主義批評者之間的交鋒，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資本主義概念與激進發展理論家所批評的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概念是

非常相像的。在此不擬複述這些討論，布倫納最近在批評彭慕蘭發表於2000年的新書^②時已經對這些討論作了回顧^③。不過，對布倫納來說，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概念與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概念的根本區別在於，後者將資本主義的動力定位在生產領域裏，而不是定位在交換領域裏。生產和佔有剩餘價值的方式決定了一種生產方式與另一種生產方式的區別。資本主義的獨特生產關係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相反，從以往的生产方式來看，生產關係阻礙了剩餘價值的生產和佔有的最大化。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無法接受弗蘭克和沃勒斯坦對歐洲的興起所作的解釋。對他們來說，激進發展理論家過份強調了領土擴張，過份強調了在美洲新大陸上所能獲得的新市場、所能開發的新資源。阿里吉等人的論點與布倫納猛烈抨擊的那種激進發展理論並不完全相同，但兩者卻非常相近。如同弗蘭克一樣，他們也認為領土擴張和新市場產生了一種動力，推動利潤的持續最大化和資本的持續積累，但他們又用了一點別的因素——地緣政治和國家引導的重商主義——來重新改寫激進發展理論。韓格理和張維安認為，在近代以前，中國的生產組織與受買主驅動的現代商品鏈十分相似；阿里吉等人也認為，技術和組織層面上的差異不足以解釋東西方的分流。他們的觀點確實帶有亞當·斯密式資本主義的痕迹。既然如此，他們如何對布倫納的批評作出回應呢？在生產關係方面是否存在某些顯著差異，從而造成了東方與西方的差異呢？或者，他們是否真的認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概念對他們要處理的問題毫無用處呢？

我想對本書發表的另外一個意見是，儘管它聲稱要解釋東亞的復興，但其主體部分卻偏於歷史描述。在結尾一章以及另外幾個章節，作者們只是稍稍留意了一下現代。在大多數情況下，本書或多或少都是在討論了其他問題後順便提到現代東亞，並沒有將其歷史論據直接、充分地運用到現代。阿里吉等人對東亞經濟復興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以前撰寫的關於該地區的論文，但其大部分篇幅都是描述性的。僅在論述「東亞經濟復興的譜系」那一節，幾位作者才試圖將他們提出的東西方分流的新論點運用到二十世紀（頁309）。「三級火箭」模型作為一個描述性概念很有用處，但關於日本以及後來中國的復興，這個模型並沒有告訴我們太多的東西，而只是說，日本和中國在復興現代式朝貢貿易體系的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最有趣的論點實際上是在本章結尾處提出的，在那裏，幾位作者將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與前現代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進行了比較。這一論點接近於國際關係研究中以霸權促穩定的理論，但歷史類比確實產生出一定的概念空間，有助於將幾位作者的歷史分析運用到現代。既然如此，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的動態機制中，究竟有甚麼東西促進了東亞的復興？遺憾的是，我們還需要等待作者們給出更詳盡的解釋。

本書作者在東亞研究的脈絡下成功地改造了發展理論的概念工具，並將最新的歷史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討論中。對任何一個有興趣了解東亞地區而不想受成見束縛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

對於日本以及後來中國的復興，阿里吉等人指出現代式朝貢貿易體系在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幾位作者把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與前現代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貿易體系進行了比較。既然如此，在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的動態機制中，究竟有甚麼東西促進了東亞的復興？遺憾的是，我們還需要等待作者們給出更詳盡的解釋。

註釋

- ① Robert Brenner,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27-92.
- ②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③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2 (May 2002): 609-62.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東亞發展、社會運動和發展社會學。主要著述有*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 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4)，合著有*East A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5)。

代謝的裂隙：東方和西方？

——從西方的興起到東亞的復興的社會生態危機

● 穆 爾

(Jason W. Moore)

《東亞的復興》旨在解釋這個「世界區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新高漲的經濟活力。我採用「代謝的裂隙」這個概念是指，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迴圈中出現了多層次的裂隙。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是社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具體體現。儘管代謝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但它在近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突出。

在《東亞的復興》中的論文，旨在解釋這個「世界區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新高漲的經濟活力。在這裏，我想集中討論〈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和西方〉一文，因為在我看來，這是本書的核心論文。

我認為，儘管這篇文章雄心勃勃，想要說明和解釋過去五百年間的東西分合模式，但它卻受到歷史資本主義概念的限制，而這一概念將社會生態關係外在化了。有鑑於此，這裏所爭論就不是觀察視角合適與否的問題，而是觀察視角本身的性質問題。由於歷史資本主義概念主要局限於競爭、衝突和革新的某些社會環節，因此，我建議用另外一種分析視角來取代它。我認為，我們必須透過現代性的主要交替和演化模式來認識生態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間的盤根錯節的關係。這些模式包括國家的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社會革命、殖民擴張，甚至還包括金融化！我採用了「代謝的裂隙」(metabolic rift) 這一概念作為我的討論的出發點。這個概念是指，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迴圈 (nutrient cycling) 中出現了多層次的裂隙。儘管代謝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但它在近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突出。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與其說是存在於一個物理環境中的社會系統，還不如說是社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具體體現。